

超越“象征”:中美贸易的解冻与博弈 (1969-1976)

丁夏阳

【摘要】1969-1976年,中美两国围绕贸易解冻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博弈。1969-1972年,尼克松政府对华实施“经济接触”政策,但未获中国的积极回应,双方最终决定建立一种政治上相对安全的“象征性贸易”。1973-1974年,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粮食致使中美贸易突破了“象征性”的贸易框架,证明了彼此之间的贸易需求与潜力。1975-1976年,中美贸易陷入危机,双方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中方认为应当将贸易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但美国却因担忧中国政局不稳而提出回到“象征性贸易”,从而推迟了中美贸易的全面突破。经济联系由此成为中美国家战略的潜在契合点。这也深远影响了1977年以后的中美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贸易;“象征性贸易”;外交战略

【作者简介】丁夏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3.2.62~73,184

经贸关系始终是探讨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总体上,1949年后的中美贸易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950年11月美国实施对华全面禁运为标志的全面隔绝阶段(1950-1969),以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部分解禁对华贸易为转折的有限恢复阶段(1969-1976),以及以1977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为契机并持续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传统研究倾向于以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模式来解释中美贸易关系的转变,例如第一阶段的全面隔绝可以视为美国全球冷战战略压制了对华贸易的经济需求;^①第三阶段的全面发展则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经济需求推动下,中美部分搁置了政治难题,从而推动了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②

显然,这套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模板不足以充分解释第二阶段的中美贸易。一些早期研究认为,鉴于中国处于特殊时代背景中,此时中美贸易

必然遵循着“政治决定经济”的范式,只作为政治议题的从属议题而被动发展,受制于两国的内政外交局势。^③然而近十年来,一些学者愈发强烈地感到中美贸易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④一方面,双边贸易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政治的衍生品,两国内部也存在着推进贸易联结的经济动力:1969年尼克松政府推出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国和苏联都成为美国扩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目标;中国也在1973年1月正式提出了“四三方案”,^⑤决意更进一步地走向世界市场。^⑥另一方面,中美双方也均有意将贸易打造为政治对话的“备用渠道”,以便在外交关系冷淡时转而让“商人”们传递有价值的战略信号。^⑦鉴于中美领导人在1969-1976年间很少就贸易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者们并无系统性的资料可以利用。这就造成了两个倾向,一部分研究的视角可能过于宏观,以致这段缺乏外交关系的贸易交往史更像是一种机缘巧合;而另一部

分研究又过于关注诸如波音飞机、化肥工厂等具体贸易内容,对其意义过分升华。总之,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中美两国对贸易议题的总体认知与安排,也就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贸易在此时期中美关系缓和中发挥的作用。

中美高层看似并不重视贸易议题的一大原因在于,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的实际外交主管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设置了一个“象征性”的总体框架,即双边贸易无需追求经济利益,而只是为政治议题制造良好氛围。这一框架始于1969年,成型于1973年,最终于1976年彻底破灭。

本文将通过考察和比对中美双边文献,探索“象征性贸易”的缘起与发展,以及中美双方围绕“象征性贸易”的博弈过程,以期重新为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发展勾勒出一个大致脉络,并重思商业在中美总体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一、1969年“经济接触”的开始

1969年7月21日,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旅游限制,为美国自1950年以后就奉行的对华全面禁运政策松绑。这一决定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啻为一声惊雷,也对日后的冷战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更长远的历史趋势来看,尼克松政府之所以选择以“经济触手”试探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根源。20世纪初,商人、传教士与政客共同推动美国形成了第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在华商业利益正式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一个重要基石。^①在重商传统与传教热情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商人很快就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某种狂热。在他们看来,地域辽阔而民众却一穷二白的中国既是财富的聚宝盆,也是美国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试金石。这奠定了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贸易热情。

然而,这种幻想迅速受到了冷战的冲击。1948-1949年,面对中国共产党即将革命成功的前景,美国国务院开始认真反思中国市场在美国战

略中的地位。1948年9月,著名的政策研究办公室发布了39号文件(PPS-39),将此前的对华贸易政策贬斥为“幻想”,并建议美国着手准备针对新中国的禁运封锁手段。^②1949年2月,国家安全文件41号(NSC-41)制定了禁运方案,但仍提出美国的最佳方案是通过与新中国保留一定的贸易联系来挑拨中苏关系。^③由于美国与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尝试大都脱离实际且混乱不堪,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并未积极响应。

1950年11月,美国宣布对华执行全面禁运,中美贸易陷入彻底隔绝之中。不过,即便美国国力强盛,要维持一项针对6亿人的贸易禁令也绝非易事。整个1950年代,美国的两大盟友英国、日本就因屡次突破对华贸易禁令而与美国龃龉不断,至1950年代末,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差别”宣告废除,东西方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④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对华贸易热情也再度复燃。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明确表示,“对华贸易禁运”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一旦政府达到战略目标就会解除。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每每与目标渐行渐远,美国商人只能眼看着英、日、法、德等商业对手突破禁令开拓中国市场。到了1960年代,无论是肯尼迪政府包含恢复贸易提议的对华“微开门”政策,还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在“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指导下酝酿的对华贸易解禁措施,^⑤虽均未实施,都足见美国早有恢复对华通商之意。

不少研究认为,尼克松放松对华贸易禁运主要是对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某种回应,^⑥但是美国自身恢复对华贸易的长期冲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尼克松自竞选时期就顺应着这股由来已久的历史潮流。^⑦早在“珍宝岛”冲突之前的2月1日,他就通过“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14号(NSSM-14)”指示基辛格放手“探索与中国缓和的可能性”。^⑧11日,基辛格在回文中首先回顾了前几届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可以执行的两个主

要选项:要么自上而下,以“联合国代表权”或“外交承认”等核心战略问题吸引中国的兴趣;要么自下而上,先以包括“恢复非战略性贸易”在内的诸多方式“扩大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基础”。当然基辛格认为两种方案都不能单独推进,美国应当在讨论战略安全问题的同时,视中国的反应而灵活运用包括贸易手段在内的“接触手段”,拉近与中国的距离。^⑥确定了大致方式之后还需要确定和解的时机。4月,中情局指出美国可以等待下一届中国领导人接班再谋求缓和,也可以与本届领导人和解,当然如果选择后者,则必须走宽松的“减缓冲突、放松孤立”路线,特别要在经济上逐步取消对华贸易限制。^⑦5月,美国政府内部就NSSM-14达成初步共识,正式确定了对华示好的政策,并决定以“贸易”政策作为先锋,“可以立即执行”。^⑧

综上,尼克松政府在1969年7月的解禁巧妙地将美国民间的对华贸易憧憬与谋求全面缓和的冷战战略结合在了一起,先以国内一致支持的贸易议题投石问路,再伺机开启战略对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尼克松只期待中国在战略层面给予回应,而不希望经济议题有实质性进展。8月14日,尼克松在听取一份关于中国的简报时记下了三条笔记:“中国派遣了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生产力和对外贸易有所下降,直到1968年”;“技术人员正在占据上风”。^⑨如果对这些信息做一个合理推断,尼克松可能认为中国1969年正在尝试整顿此前的经济乱局,恢复生产力,这提升了技术人员的话语权,而技术人员则必然倾向于依靠国际市场,为此中国甚至不惜同敌对的苏联进行贸易谈判。既然苏联都可以在中国扩大对外贸易的进程中分一杯羹,美国为何不可?果然,到了9月,尼克松就指示美国政府应当“准备好在贸易问题等具体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⑩

尼克松的判断或许是基于中国1950年代末的发展经验,彼时中国的“大跃进”几乎同步辐射到了对外贸易,一时间进出口额都在巨幅增长。^⑪

然而1969年的情况有所不同,鉴于1966—1968年中央财政收入大幅缩水,^⑫中国并不打算进一步依靠世界市场,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许动用外汇进口。^⑬尽管1969年是“三五计划”的重要冲刺时期,周恩来仍然同意了外贸计划的进一步紧缩,在3月底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从外交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决定:中国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八亿人的国内市场”而非“二亿人的国外市场”;如果过分依靠国外资源,则无异于将这份天然的经济优势拱手让于西方国家,“他们还要翘尾巴”;反之,如果中国能在经济上“做到不求他人,让他们求我们”,则不止加拿大、意大利会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寻求同中国建交,“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将因为“看中这市场”而寻求改变对华政策。^⑭这种经济上“无欲则刚”的策略很快成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指导思想。6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到访的罗马尼亚外宾表示,“既然中华民族不愿在其经济、政治准备不足的时候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现在就更不愿意接受”。^⑮

可见,中国对美国伸来的“经济触手”并非毫无预料,甚至认识到对华贸易冲动正是推动美国做出改变的根源之一。然而,中国更多地将“经济接触”理解为示弱,而非美国政府希望表达的示好,因此决定拖延回复。作为中国重要的临时外交参谋机构,由陈毅领导的“四人小组”于7月正式讨论了尼克松在贸易和旅游上的“两个放宽”政策,最终的结论是“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作为应对之策,陈毅又在8月提出,既然“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该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⑯

总体上,周恩来“无欲则刚”的原则以及陈毅延迟回应以等待美苏提高报价的策略,的确促使美国不断增大对华接触的力度,并于1970年1月恢复了华沙会谈,但也基本否定了中国从经济上回应尼克松“经济接触”政策的任何可能性。中国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前的所有正式会谈场

合都拒绝对美国的贸易议题作出正面回应。

二、走向“象征性贸易”(1970-1972)

中国的冷淡回应首先造成了美国内部分歧,在“华沙会谈”恢复之后,基辛格主导的国安会认为,既然中国对贸易议题无动于衷,那么美国就应当采用“自上而下”——先确定战略共识再增进贸易关系——的方式发展两国关系。与之相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主导的美国国务院则坚持认为采取“自下而上”——先推进贸易项目再上升到战略议题——的策略才最为稳妥。^②

中国内部在对美贸易策略上同样产生了一些分歧。尽管中国最初并不希望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但两个因素还是促使其进出口规模逐步扩大。第一是为了弥补“三五计划”前三年的损失,中央为1969、1970年制订了高于实际生产能力的经济指标,从而导致各地工厂因缺材少料而不断申请“特批”进口;第二是中国银行部门了解到主要西方国家正面临“一场新的金融风暴”,法郎、英镑的贬值可能波及中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因而提出中国与其坐等货币贬值,不如“减缩”一部分库存外汇,换成重要物资。^③于是,周恩来在1970年采用了更为务实的外贸方针,将外贸工作特别是引进工作从政治运动中剥离出来,强调对外贸易还是应当以实用为主要原则,^④同时要避免对西方资本家的猛烈批判影响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只要“我们国家起来了,得到了好处”,就不用在乎西方资本家是否“钻进来做买卖”“赚了钱”。^⑤

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的外贸官员们自然希望探索世界市场的一切可能——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内。1970年1-3月,中国在香港的特别外贸机构华润公司与中国驻波兰使馆官员分别就有色金属与药品,以及美国农业出口情况向美方提出了“礼貌”的咨询,但又迅速“不明原因”地撤回了请求。^⑥中方的态度反复可能源自周恩来的警觉,显然,更加务实的外贸政策并不意味着周恩来改变

了“无欲则刚”的总体方针。4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商团时表示,中国将不考虑同“在日本的美国子公司”进行贸易。^⑦当然,正如日本外务省随后向美方分析的那样,周恩来并非是想彻底断绝中美贸易的可能性,而是提醒美方若想与中方讨论贸易问题,需要特定的场合与政治条件。^⑧

1970年5月,初见和缓的中美关系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陷入僵局。^⑨此时,备受中方冷落的贸易议题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展。几乎在与美国陷入新一轮外交战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正在为另一件事感到头疼:即便中央已经向地方下放了一部分外汇的使用权,各地工厂的材料与设备短缺仍然得不到缓解。同样是在5月,外贸部决定组建一个采购团去英、法、意大利等国大规模订货。^⑩其中一笔订单是向意大利进口8辆自动卸货车,这种卡车的柴油发动机及其部分零件来自美国,在美国政府的管控清单上介于军事与民用之间,于是通用公司于6月底迅速向美国政府作了申报。尽管无法判断中国是否清楚这笔进口需要美国政府的审批,更不知道此举是否是在试探美国的和解意愿,7月24日,尼克松还是亲自批准了这项贸易。^⑪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当年10月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美国释放善意的决定正是对这笔卡车交易的回应;相应地,“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同样没有留意到毛泽东“过于拐弯抹角”的示好信号。^⑫然而,无论如何,至少在尼克松看来,“卡车交易”无疑是美方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正向激励,它不仅暗示了中国对美国的潜在善意,更说明中国对美国无可避免地存在经济上的需求。

正如尼克松所料,中美在贸易领域的接触不可避免,双方领导人对此亦有着清醒的认识。1971年伊始,中美双方都开始为恢复双边贸易做前期准备。美国方面尽管内部分歧已日益显现,但仍一致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同中国“启动有控制的、直接的经济关系”。^⑬具体而言,美国将在近期

继续解除诸如货币、燃料、航运等方面的对华限制措施；作为第二步，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华进出口商品目录，使中国享受与苏联同等贸易待遇；最后，美国将在“粮食出售”和“贸易代表”方面加强对华贸易联系，同时寻求给予中国超越苏联的贸易待遇。^③1971年4月，尼克松顶住司法部和国防部压力，批准了国家安全备忘录第105号文件(NS-SM-105)，象征着存续几十年的对华贸易禁运第一次被大幅度取消。^④

有证据显示，中国方面也在为对美贸易创造环境。比如1971年3月的一份外贸部文件特别提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能够“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构成战争威胁的资本主义国家居首位的就是美国，因此这一新表述很可能是在为对美贸易寻找正当理由。此外，中国驻外商业机构还在各类场合隐晦地表达增进中美贸易之意。^⑤5月，华润公司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直接进口了美国产品，当然为了规避海关审查，还特意将“美国制造”的字样涂掉，再贴上英国、日本的商标，结果还是被海关扣押。有趣的是，外贸部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一面认定进口美国产品的确会“造成可能为美帝所利用的把柄，产生对我不利的影响”，一面又迅速责成海关放行，并未予以追究。^⑥

当然，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绝非长久之计。1971年4月毛泽东以推动“乒乓外交”的方式，部分回应了美国的“旅游”解禁政策，在贸易领域自然也需要拿出方案。5月26日，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中美贸易做出了明确指示：“我不主动提及贸易，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⑦贸易正式进入了中美和解谈判的议程。

然而，中美高层并未立即探讨贸易问题。7月，在基辛格对中国进行震动世界的秘密访问之前，尼克松曾特意嘱咐他要同中方探讨“粮食或其他贸易”的可能性。^⑧但美方档案显示，基辛格在

访问期间同周恩来探讨的7个主要议题中并不包含贸易。^⑨对贸易的疏漏似乎是双方不经意的“默契”，正如许多历史学家观察到的，基辛格对贸易议题既不熟悉也不重视，甚至认为贸易谈判“烦人”。^⑩中方也一如既往地不愿在双边场合对此表露丝毫兴趣。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真的对中美贸易前景无欲无求。9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仅仅两个月后，作为地方口岸的上海也开始着手应对中美贸易的再度开启，上海市革委会要求收集“美帝”“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材料，特别是活材料”，并“做出过细分析”。^⑪同月，外贸部更是断言“美帝对我长达二十一年的所谓‘封锁’、‘禁运’已宣告完全彻底地破产”。^⑫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理应走出以“突破美帝封锁”为主要任务的“反封锁”时期，而进入“与美帝通商”的下一阶段。

1972年2月，作为访华的预热，尼克松在临行前批准并宣布了“最后一个单方面的经济姿态”，^⑬给予中国与苏联同等的贸易地位。或许是作为回应，毛泽东在同尼克松会谈时也将中国此前对贸易和人员交往的冷淡回应贬斥为“官僚主义”，并赞许美国“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是正确的。^⑭此后，共同促进贸易也成为上海公报的重要条款，美国商人受邀参加当年的春季“广交会”，中美贸易也于当年正式恢复。

然而，中美贸易刚刚恢复不久就陷入了新的困局。1972年3月，美国国务院主导出台的两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148、149号文件(NSSM-148、NSSM-149)显示，中美贸易的短期前景黯淡，两国几乎不可能迅速跨越经济体制差异与长期隔绝造成的贸易嫌隙，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美国国安会在随后的审查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只从经济角度追求中美贸易的快速增长有损美国的政治利益：不仅会增加美国政府内部的部门冲突，还会导致美国民间的对华贸易热情失控。更重要的是，过快发展的中美贸易将使美国明显地偏向中国大陆一边，损害美国在三角关系中的灵活性，也危及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同盟”关系。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对扩大双边贸易的态度仍不明朗,一旦中美贸易出现巨大失衡,导致美国被中国视为“经济掠夺者”,则美国推进贸易的努力将完全得不偿失。^⑤不久,基辛格就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成立一个由美国商人组成的“对华贸易委员会”,由民间机构去推进双边贸易。

其实此时,中国对扩大中美贸易的态度并不复杂。在进口端,诚如美方所料,中国在禁运期间已与其他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关系,美国大体被视为其他西方国家的替补供应商。然而在出口端,美国显然是一块处女地。1972年4月,外贸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美国市场大有可为,症结只在于美国仍对中国商品征收重税,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主动要求美国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而此举必然导致中国放弃贸易议题上的外交优势,悖离“无欲则刚”的总体原则。因此,外贸部同样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鉴于有美商“表示要同美政府的歧视关税政策作斗争”,中国应该鼓励这些“美商”在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⑥

至此,中美都失去了在政府层面推动贸易实质进展的动力,而将主要的问题丢给民间机构去处理。^⑦1973年2月,基辛格在同毛泽东会谈时特意将话题引向美国对华贸易歧视,但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还很穷”,并不急于破除障碍,扩大双边贸易。于是,基辛格提出,中美贸易应当是“象征性”而不是“商业性”的,旨在“建立一种对双方政治都必要的关系”。毛泽东欣然同意。^⑧中美贸易的“象征性”框架正式确立,双方高层将致力于发展一种平衡且规模有限的双边贸易。

三、突破“象征”:中美贸易的新局面(1973-1974)

然而,顶层设计并非历史的全貌。1972-1976年,在“四三方案”主要聚焦的机械设备领域,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的确只集中在波音飞机、化肥工厂等有限的领域,进口额始终维持在1亿美元

上下,与总体出口额大致相抵。^⑨1973年突然膨胀的中美粮食贸易显然超出了双方原先设计的框架,将两国经济关系推向了未曾设想的新高度。与“四三方案”一样,大规模引进粮食同样是为了应对197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

1970年的新一轮经济“跃进”计划贪大求全,不计后果地投入生产,造成了中国经济工作的全面被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粮食供应问题。一方面,中央为了刺激各地的生产热情而不断下放权力,使得各地盲目招工,吃公粮的人口迅速膨胀,布匹、副食品也很快告急;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进一步加深了危机。^⑩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在1972年又遭遇了1962年以来最恶劣的气象灾害,南涝北旱,农业总产值下降1.04%。^⑪至当年年底,粮食供应缺口已高达672.5万吨,约占总供应量的15%。^⑫

毛泽东对供应问题相当关切。据前轻工业部部长陈锦华回忆,1971年8月,毛泽东就在长沙的一次考察中了解到城市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以至于他在“九一三事件”的第二天就主动询问周恩来是否可以通过引进设备缓解这种矛盾。^⑬这次谈话使得周恩来得以放手解决被他归纳为“三个突破”的经济乱象,^⑭并逐步在1972年形成了一套以农业生产设备为主的引进方案。^⑮当然,远水难解近渴,由于大多数设备需要五年左右投产,中国还必须考虑扩大粮食进口。

自1971年底开始,中国明显追加了粮食订单。然而,与机械设备一样,美国最初同样只被视为一个边缘粮食供应商。1972年中美贸易恢复之际,中国也只是试探性地报价了少量美国小麦,以避免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小麦的过度依赖。^⑯9月,当基辛格兴致勃勃地向黄华询问两国粮食贸易前景时,也只得到了“尚不明确”的答复。^⑰

1972年底,3个重要因素为中美粮食贸易带来了转机。首先是毛泽东认为中美关系虽然已经

升温,但国际格局仍不明朗,中国仍面临着较大的战争风险。^④1972年,他参照《明史·朱升传》的故事提出了“广积粮”的策略,并于当年12月正式下发。^⑤这就意味着中国原本就紧张的粮食工作不仅要保障生产生活供应,还增加了额外的储备任务。其次是当年11月,中国原先计划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粮食因外交纠纷而被迫取消,^⑥从而失去了第二大粮食供应国。当然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苏联借美国放宽粮食出口限制之机,于当年7-10月疯狂购入近1750万吨美国粮食,导致全球粮食市场供应吃紧。^⑦中国外贸部于10月底才发现这一情况。^⑧作为应对,1973年中国粮食总进口量高达812.79万吨,为1972年的1.7倍,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最高水平。^⑨而美国则一跃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粮食进口来源国,提供了420万吨粮食,占中国粮食进口总额的51.2%。^⑩

中美此前基于悲观预期而设计的“象征性贸易”框架显然受到了严重挑战。作为对比,1973年2月在与基辛格确立“象征性”原则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对两国1972年产生的3000万美元贸易逆差表示不满。^⑪然而,1973年双边贸易逆差已达到了惊人的6.16亿美元,其中约76.9%是由中国进口美国粮食造成的,而中美贸易总额也从1972年的约1亿美元飙升至超过8亿美元。^⑫这显然严重违背了中国1972年坚持双边贸易“一定要出口大于进口”的原则。^⑬更重要的是,美国这个西方国家的“替补”贸易对象在这一年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五大贸易国。

对这一预期之外的突破,中美双方几乎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总体上,美国政府乐见中国参与国际市场,因为这基本必然会导致中美经济产生更多交集。^⑭问题只在于这一趋势是否稳定。中情局在1973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此次中国大规模进口设备与粮食并非此前那样的小修小补,而是说明中国正在尝试将“接受外国帮助”纳入经济发展规划,实属“重大进展”。^⑮这一转变是

“对60年代错失时间的弥补”,^⑯也是对1970年代初激进发展路线的某种纠偏。^⑰从短期来看,美国纵然更希望中美贸易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但美国自20世纪初就对参与中国现代化充满兴趣,只是苦于始终未逢良机。此时,中国在农产品和化肥设备方面的急迫需求无疑正是美国的强项所在,^⑱美国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对中方而言,美国粮食与贸易赤字纵然刺激着中国的敏感神经,但中国同样没有出手干预的意思。在1973年11月的一次民间贸易谈判中,中方表示注意到了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但中方并不强求双边贸易的“绝对平衡”。^⑲

不过在1974年,刚刚突破“象征”的中美贸易迎来了两个主要挑战。首先是由于“批周风波”,中国单方面中断了为未来贸易扫清法律障碍的“私有权利”谈判,^⑳之后又以在美方看来“极为敷衍”的理由暂停了两国民间贸易机构的进一步交流。^㉑其次,作为两国贸易的绝对核心,粮食贸易也受到一种名为“小麦矮腥黑穗病”的病害侵扰:中国自1973年8月发现进口的美麦大量带有此病后,就坚持要求美国确保出口的小麦做到“零感染”,否则就退货退款;^㉒美国则认为中国过于严苛,拒绝接受中方的“零容忍”政策。^㉓这一纠纷甚至造成了双边粮食贸易近两个月的中断。

虽然美国担心两国脆弱的经济联系受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干扰,^㉔但仍对贸易前景感到安心。首先,中国对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贸易代表与普通美国商人采取了明显的区别政策,后者仍能访问多数开放城市。^㉕这说明中国无意改变中美贸易的进程,而只是希望美国政府可以置身事外,^㉖以免后者利用贸易绕开中国领导人眼中更为紧要的政治议题。针对美国官方的访问禁令也于1974年底基本解除。^㉗此外,通过简单地协调检疫标准,中美出人意料地在1974年6月迅速达成了解决“黑穗病问题”的“君子协议”,^㉘不仅先前暂停的小麦贸易得以恢复,中国又在7月追加了美国

粮食订单,^⑧中美贸易突破“象征”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中方档案也表明,中国之所以愿意顶住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无视贸易逆差和各类纠纷,容忍甚至不断扩大美国粮食进口,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外交目的,而是单纯因为美麦量大且价格便宜。^⑨这一点足以证明中国也可以从纯粹经济角度思考中美贸易问题,而忽略它会产生政治影响。反推之,如果近两年的贸易进展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议题,那么1974年的两次风波应该可以轻松破坏这一脆弱的贸易连接。事实上,1974年中美贸易额一度有望突破10亿美元,单单中国签下的美国粮食订单就已接近7亿美元。^⑩由此,中情局甚至预言中国将“很快轻松超过苏联,成为美国主要的共产主义客户”。^⑪

总之,1973—1974年中美贸易突破“象征”,可以看作是中国或有意、或无意地向美国发出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现代化请柬”,“邀请”美国在“四三方案”引进的农业设备投产之前,在粮食问题上对中国施以特别帮助;而作为回报,中国将在未来与美国讨论经济上的“长期需求”。^⑫

四、中美对贸易危机的不同应对(1975—1976)

好景不长,1975年,中美贸易并未继续飞跃,而是从9.2亿美元巨幅跌落至4.6亿美元。^⑬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感到恐慌,其驻北京联络处1月的报告比较代表性地反映了美国对贸易危机的初步反应:双边贸易额的巨幅下跌不仅可能预示着此前的种种危机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还可能成为中国关闭国门的前兆。^⑭

然而,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此次贸易额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1974年底爆发了严重的外汇危机,从而不得不大幅削减美国粮食订单。^⑮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直到1974年第四季度才突然意识到本国的进出口之间存在着近12亿美元的巨额逆差,^⑯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建国以来历年贸易逆差的总和。在主要的进口项目中,机械与工业原材料进口与“四五计划”“五五计划”指标

密切挂钩;相比之下,主要用于补充库存且额度巨大的粮食进口自然成为了缩减逆差的突破口,遭到了大幅削减。而在中国的主要供粮国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尚未与中国签署《每年最低认购协议》的国家,取消美国粮食订单不会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加之此前的黑穗病以及由此引发的港口延误问题进一步降低了违约成本,因此中国在1975年初宣布全面取消美国的粮食合同。^⑰

如此看来,与其说1975年的中美贸易下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种种矛盾,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外贸体制的弊病——本该严丝合缝的计划经济竟然对如此巨大的外汇赤字毫无察觉。一些中方档案显示,问题出在出口产品的定价上。长期以来,中国进出口模式大体上是国家根据生产情况预估出口额,并向各地下达出口指标;之后再根据预估的出口情况安排进口。然而1970年之后中国进出口不断扩大,外贸系统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可想而知,在固定的出口指标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上海)产品质量高、销路好,自然倾向于以“厚利少销”的方式降低生产负担;反之,工业基础较差的地区不得不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才能勉强完成任务。^⑱而在“统制外贸”的体制下,类似产品必须统一定价,否则就会造成各口岸的“抬价抢购、低价竞销”的乱象。^⑲于是,如何定价就成为了一个老难题。虽然李先念曾在1972年底明确指示出口价格要“随行就市”,灵活掌握,^⑳但各部委真正掌握的国际市场的资料极其有限,“搞行情的工作人员”也是少之又少。^㉑1974年初,中国最大的几个外部市场急剧萎缩,出口疲软,^㉒而中国却在广交会上“狠批降价风”,坚持高价销售,^㉓最终也只能在外商的困惑中坐看出口换汇产品在仓库中堆积如山。^㉔

有失必有得,堆积如山的外贸商品的确限制了中国购买美国粮食的能力,但也凸显了美国作为中国新兴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在巨大的库存压

力下,1974年8月,一向将“中间商”与“佣金”贬斥为“资产阶级黑心商人”的上海口岸,竟然主动提出要向中美贸易的“中间商”支付10%-20%的佣金,以便“抢占美国市场”,“买卖做大了,还可给他更大折扣”。^⑩1975年,中国更是与美国一同安排了20多个贸易代表团奔走于两国之间,以期深入考察美国市场,^⑪并着力改善中国在价格与市场需求方面的信息漏洞。在一些场合,中国外贸机构甚至会放下此前的“高姿态”,“以政府的名义”对美国的对华贸易壁垒表示不满。^⑫

然而,“象征性”贸易又严重束缚了中国开发美国市场的能力。从逻辑上讲,既然贸易只是政治关系的陪衬,中国就不应在双边贸易中提出任何“我有求于美帝”的议题,但是如果中国不放下“身段”,主动同美国协商扫清诸如关税壁垒在内的贸易障碍,外汇危机将再次重演。在更大的战略格局上,维持“象征性”贸易也并非明智之选,1974年的外汇危机足以说明,中国无力同时承担以“四三方案”为标志的快速现代化,以及以大量进口粮食为代表的大规模战备任务。因此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不应只停留在粮食供应上,而应当寻求美国在战略上帮助中国减轻战备压力,这样中国就能更加集中精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反之,倘若两国贸易只停留在某种“象征”意义,而不真正上升至战略层面,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毛泽东、邓小平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中美贸易固然遇到了危机,但无论是退回“象征性”贸易还是以取消“象征性”贸易来威胁美国,都不是解决之道。唯有在1973-1974年中美贸易突破“象征”的基础上,主动谋求超越“象征”,才能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或许是由于1975年中国国内关于“洋奴”的争论甚嚣尘上,中国领导人并未明确提出要推进两国贸易,但的确表露出希望超越“象征”之意。与毛泽东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对话中一样,邓小平也在1975年几次接见美国客人时或多或少坦承了中国的经济窘境,不同

的是他并未由此得出中美贸易“前景黯淡”的结论,而是强调双边贸易未来可期。^⑬这再次确认了中国邀请美国参与本国现代化,并且其身份不再是“紧急供货商”,而是未来的长期贸易伙伴。当然,这份“请柬”也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在1975年10月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暗示美国应当给予苏联足够的战略压力,以减轻中国“广积粮”的战略负担,倘若美国对苏联“软弱”“不可靠”,则中国只能继续埋头挖洞积粮,而无暇从事现代化建设。^⑭这一表态显然有批判美国之意,但也是希冀美国转换思路,从战略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帮助。此举虽然会在短期内导致中国不再需要美国粮食,但正如邓小平所言,两国如果能够在战略层面将中美关系推入下一个阶段,则“中美贸易的前景就会更加宽广”。^⑮

与中国的长远规划相比,美国政府似乎忽然变得“短视”起来。尽管美国并不怀疑中国的现代化决心,也不怀疑中国将继续努力“从美国获得某些技能和材料来增强本国实力”,^⑯但从中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来看,中国存在政权交接的可能性,^⑰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为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也仍是未知数。故而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与基辛格均不愿与中国立即就战略问题达成一致。^⑱相反,基辛格认为,既然两国没有粮食贸易提供动力,就应当回到此前的“象征性”贸易模式,美国应当寻求与中国达成更灵活的贸易协议作为“全面正常化的替代性步骤”,从而使两国人民“感受到关系的加强和走向正常化的持续势头”。^⑲可想而知,在10月的会谈中,邓小平对基辛格陈旧的贸易提案毫无兴趣,表示这类问题“一百年不解决也没关系”。^⑳

进入1976年,中美两国都忙于内政问题,对双边关系均是力不从心。美国国安会于当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建议,鉴于中国当前的局势已超出了美国可以施加影响的范畴,美国最好成为“被动的观察者,就像中国人看待水门事件一样”。除非

美国政府“重新启动一个更加坚定和一致”的外交政策,否则中美关系将难以恢复1972-1973年的活力。^⑩当然在混乱之中,美国在8月得出了两个重要判断。其一,无论未来的中国政局如何变更,或者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又将把中美关系推向何方,中苏都几乎再无重修旧好的可能性;其二,从长远来看,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激进路线已“不适合(完成)中国落后经济和传统社会现代化这一复杂任务”,因此“更加温和、务实”经济政策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⑪这就意味着中国必然会与世界市场发生更大的联结,而在这场“公平竞争”中,美国将必然比苏联更深入地参与其中。这也正是1977年之后所发生的历史。

结论

对上述历史进程的梳理表明,1969-1976年,中美围绕贸易解冻与发展的问題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博弈。第一阶段是1969-1972年,尼克松政府成功结合对华贸易冲动与缓和战略需求,对中国实施了“经济接触”政策,希望从中获得战略、经济双重利益;但中国希望将贸易打造成“美帝有求于我,而我无求于美帝”的外交筹码,因此双方最终只得各退一步,将贸易限制在“象征性”框架内。第二阶段是1973-1974年,中国为了解决粮食供应危机而向美国大规模进口,致使中美贸易突破了“象征性”的框架;随后,中美又成功解决了两起贸易纠纷,证明了彼此之间的贸易需求与潜力。第三阶段是1975-1976年,中美贸易陷入危机,但中国主张通过超越“象征”,即将贸易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的方式来推进两国关系,但美国却因担忧中国政局不稳而提出回到“象征性贸易”,从而将中美贸易的全面发展推延到了下一个时期。

由此可见,贸易议题并非被中美领导人所忽视,而是双方意识到贸易的巨大潜力后选择暂且搁置,以免损害战略利益。因此与传统研究经济、政治相互决定的认识不同,商业在1969-1976年

的中美和解中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无足轻重的“晴雨表”,也不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压舱石”,而是在不断的博弈中逐渐成为中美国家战略的一个潜在契合点——中国对于现代化的渴望逐渐与美国参与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愿景相重合,并表现出了加入而非取代两国战略议题的趋势。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冷战格局为中美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与动力,但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还是取决于两国自身的历史愿景以及对对方愿景的认同。中国日益加深的开放决心不断获得美国认可,增强了美国参与中国现代化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又使中国不断提高美国在外贸政策中的地位,从1969年的拒之门外到1975年主动在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中为美国的参与划出一席之地。正是这种良性互动最终推动中美贸易由隔绝走向“象征”,继而又超越“象征”,并深远影响了1977年至今的中美关系。

注释:

①尤建设:《20世纪50年代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的较量》,《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

②刘磊,于婷婷:《1979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

③如陈从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贸易关系》,《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李金亮:《七十年代的中美贸易关系》,《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等。

④Mao Lin, "More Than a Tacit Alliance: Trade, Soft Power, and U.S.- Chinese Rapprochement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24, 2017.

⑤指中国1973年决定在3-5年内以43亿美元引进大型机械设备的计划,参见陈东林:《开放的前奏:“四三方案”及其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1期。

⑥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宋旻在其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亦高度强调中国在处理对美贸易问题上的经济动力,参见Min Song, "Economic Normalization: Sino-American

Trade Relations from 1969 to 1980," PhD, Georgia University, 2009。反之,一些特定的贸易也为中美缓和注入了活力,如粮食贸易,参见 Min Song, "A Dissonance in Mao's Revolution: Chinese Agricultural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972-1978," Diplomatic History, Vol.38, 2014; 再比如石油贸易,参见 Kazushi Minami, "Oil for the Lamps of America? Sino-American Oil Diplomacy, 1973-1979," Diplomatic History, Vol.41, 2016。

⑦关于中美民间贸易交往,可参见 Christian Talley, *Forgotten Vanguard: Informal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1972-1980*, Nor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Press, 2018。类似的观点可参见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2-220 页。

⑧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 页。

⑨"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mart)," November 16, 1948, FRUS, 1948, Vol.7,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 1948, Vol.7, China, p.575。

⑩"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ouers),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February 28, 1949, FRUS, 1949, Vol.9, China, pp.827-834。

⑪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0-361 页。

⑫刘子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2、201 页。

⑬如张静:《尼克松政府放松对华管制政策出台前后》,《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9 期。

⑭《尼克松回忆录》(上),伍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6 页。

⑮"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February 5, 1969,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8。

⑯"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February 11, 1969,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11-12。

⑰"Summary of the CIA Response to NSSM 14,"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30-31。

⑱"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May 15,

1969,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32-36。

⑲"President Nixon's Notes on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68。

⑳"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9, 1969,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80。

㉑关于中国 1958 年“大跃进”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可参见 Jason Kelly, *Market Maoists: the Communist Origins of China's Capitalist Ascent*,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126-157。

㉒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5 页。

㉓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56 页。

㉔《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9 年 3 月 25 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第 433 页,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中心藏。

㉕"Telegram from Aurel Duma to Corneliu Manescu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Passed to the PRC Foreign Ministry Regar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10th RCP Congress and the Intention of Certain American Senators to Visit China," 3 June 1969, A. M. A. E., fond Telegrams, Beijing, Vol.II, 1969, f.74-77. Published in *Relatiile Romano-Chineze, 1880-1974*[Sino-Romanian Relations, 1880-1974], edited by Ioan Romulus Budura, Bucharest, 2005, pp.921-923.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Madalina Cristoloveanu。

㉖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9-181 页。

㉗关于尼克松政府内部关于“经济接触”政策的分歧,可参见丁夏阳:《尼克松政府对华“经济接触”政策与实践——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1973 年访华”为案例》,《历史教学问题》2021 年第 6 期。

㉘《李先念年谱》第 4 卷,第 578 页。

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 3 卷(1966-1976),内部讨论稿,2007 年,第 189 页。

㉚外贸部档案:《周恩来在审查外贸部核心小组报告时的指示》(1970 年 10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 3 卷(1966-1976),第 186 页。

㉛ Telegrams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in Hong Ko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5 and 30 January 1970, RG 59, Central Files 1970-1973, FT 1 CHICOM-US, NARA-College

Park;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Warsaw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31 March 1970, RG 59, Central Files 1970-1973, POL CHICOM-US, NARA-College Park; Min Song, "Economic Normalization: Sino-American Trade Relations from 1969 to 1980," pp.28-29.

⑫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3页。

⑬"Telegram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in Hong Ko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7 April 14, 1970, RG 59, Central Files 1970-1973, POL CHICOM-US, NARA-College Park; Telegrams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okyo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8 and 20 April, 1970, Ibid. Min Song, "Economic Normalization: Sino-American Trade Relations from 1969 to 1980," p.29.

⑭关于中美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外交争端, 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332-333页。

⑮《李先念年谱》第5卷, 第43页。

⑯《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第3卷, 方辉盛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第873页。

⑰《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第3卷, 第874页。

⑱"Draft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06," February 16, 1971,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265.

⑲"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March 25, 1971,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284-286.

⑳"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297.

㉑Min Song, "Economic Normalization: Sino-American Trade Relations from 1969 to 1980," pp.44-45.

㉒Administrative Files: Stankard and J. V. Reed to Eugene Theroux, July 16, 1973, PRCLC-Correspondence(1)-(7), Achieve Unbound: Records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1973-1983 Collection, Hereafter AU: NCUSCT, p.11.

㉓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第353页。

㉔"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355.

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359.

㉖威廉·伯尔:《给贸易“投下阴影”: 美中之关系中的私有权利和封存资产问题(1972-1975)》, 贺艳青译, 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0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第181-220页。

㉗上海市外贸局:《关于参加1971年秋季广交会的请示报告》, 1971年9月20日, B170-3-73, 上海市档案馆藏。

㉘对外贸易部办事组编《关于美国对外贸易资料》, 1971年9月22日, 《外贸调研》第9期。

㉙《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第3卷, 第1306页。

㉚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第428页。

㉛"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and Robert Horma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866.

㉜对外贸易部办事组编《从广交会对美商成交情况看中美贸易问题》, 1972年5月10日, 《外贸调研》第39期。

㉝关于1972-1976年中美民间贸易机构的交往, 可参见Christian Talley, *Forgotten Vanguard: Informal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1972-1980*, pp.45-104.

㉞"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17-18, 1973, FRUS, 1969-1976, Vol.18, 1969-1972, China, pp.130-131. 中方记录可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 第427页。

㉟哈里·马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柯雄等译, 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第159页。

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1966-1976), 第151-152页。

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1966-1976), 第173页。

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1966-1976), 第152页。

㊴陈锦华:《国事忆述》,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8-9页。

㊵“三个突破”指中国的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 工资支出突破三百亿元, 粮食销售突破八百亿斤(约4000万吨),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第500页。

㊶阎放鸣:《论我国第二次成套设备的大引进》,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㊷《李先念年谱》第5卷, 第212页。另据《李强传》记载, 1972年4月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就已经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

开展试探性谈判,但美方“并无诚意,十分傲慢,并且报价偏高”,参见紫丁:《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309页。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8, 1972,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1070.

④ 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著《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48页。

⑥ 《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234-235页。

⑦ 丹·摩根:《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国际粮食贸易》,张存节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⑧ 《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229-230页。

⑨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198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第IV-118页。

⑩ Chad J. Mitcham,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Japan, 1949-79: Grain, Trade and Diplomacy,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213.

⑪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15, 1973, FRUS, 1969-1976, Vol.18, China, p.29.

⑫ "Chinese Affairs," 30 October, 1973,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5t00875r000700020019-9>,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⑬ 《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175页。

⑭ Cable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ate,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hereafter AAD), 12 December 1973, 1973HONHKONG03071.

⑮ "Chinese Affairs," July 23, 1973,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5t00875r000700020012-6>,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⑯ Cable from U.S. Mission, NAT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30 July 1974, 1974NATO04147.

⑰ "Implications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August 1, 1973,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5t00875r001500190010-1>,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⑱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31 March 1974, 1974PEKING00544.

⑲ Administrative Files: Subject File, Final Report, Summary of meeting with Li Chiang,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at the Ministry of Trade, November 8, 1973, PRC, NCUSCT, pp.85.

⑳ 威廉·伯尔:《给贸易“投下阴影”,中美关系的私有权利和封存资产问题》,贺艳青译,《冷战史国际研究》,2010年第2期。

㉑ 有关此类冷遇的讨论还可参见丁夏阳:《和解时期的中美贸易——以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为核心考察(1973-1976)》,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7年,第21-24页。

㉒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10 October 1973, 1973PEKING01179.

㉓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15 March 1974, 1974PEKING00444.

㉔ "Implications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August 1, 1973,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5t00875r001500190010-1>,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㉕ AAD,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18 March 1975, 1974PEKING00273.

㉖ Cable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AAD, 16 March 1975, 1974STATE003450.

㉗ Cable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AAD, 15 November 1974, 1974STATE252410.

㉘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11 June 1974, 1974PEKING00967.

㉙ "Orders On U.S. Corn Canceled by China," New York Times, 15 June 1974, p.45.

㉚ 陆良伟:《上海市革委会电话询问商业部粮食局有关市接受美国带病(黑穗病)小麦问题情况的汇报》(上),1974年6月17日,B135-4-649-27,上海市档案馆藏。

㉛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27 September 1974, 1974PEKING01683.

㉜ "Economic Intelligence Weekly," July 31, 1973,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5t00875r001500150033-0>,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㉝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July 5, 1973, FRUS, 1969-1976, Vol.18, China, p.286.

㉞ John W. De Pauw, U.S.-Chinese Trade Negoti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82, p.5.

㉟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

tary of State, AAD, 18 January 1975, 1975PEKING00082.

⑨ Min Song, "A Dissonance in Mao's Revolution: Chinese Agricultural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972-1978," *Diplomatic History*, Vol.38(2014).

⑩《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368-369页。

⑪关于中国1975年取消美国订单的过程及原因,可参见 Xiayang Ding, "Economics vs. Diplomacy: Examining the Roots of Decline in Sino-U.S. Trade in 1975,"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8)2021.

⑫上海市外贸局:《1970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报告》,1971年5月31日,B170-3-2-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⑬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⑭《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235页。

⑮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报告:《关于当前外贸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情况汇报》,1972年6月28日,11248-2-478-2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⑯ 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Trade Polic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54, 1975.

⑰上海市外贸局革命委员会:《关于1974年上海口岸参加春交会情况汇报》,1974年5月25日,B170-3--273-25,上海市档案馆藏。

⑱上海市外贸局革命委员会:《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外贸仓库困难的紧急报告》,1974年5月10日,B248-1-550-77,上海市档案馆藏。

⑲上海市外贸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参加1974年广交会的请示报告》,1974年10月8日,B170-3-273-58,上海市档案馆藏。

⑳邓峥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6年,第82页。

㉑ Cable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ate,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27 June 1975, 1975HONGK07226.

㉒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2, April, 1975, 1975PEKING00586;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1 January, 1976, 1976PEKING00019.

㉓ "Paper Prepar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Lord)",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18, China, p.831.

㉔ Cable from the U.S. Liaison office,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AD, 25 August 1975, 1975PEKING01623.

㉕ "Cia Analysis of China in 1980-85, and in the Year 2000", August 20, 1974,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loc-hak-541-1-8-1>,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㉖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cowcroft) to President Ford," March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19, 1976, FRUS, 1969-1976, Vol.18, China, p.921.

㉗ "Research Study: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ino-Soviet-US Triangle," August 1, 1975,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4b00506r000100070009-9>,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㉘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0, 1975, FRUS, 1969-1973, 1969-1976, Vol.18, China, p.761.

㉙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5, FRUS, 1969-1973, 1969-1976, Vol.18, China, p.802.

㉚ "Copies of My China Analysis for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Kissinger," March 8, 1976,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loc-hak-113-1-5-9>,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

㉛ "Mao's Last Hurrah: the Campaign Against Teng Hsiao-Ping," August 1, 1976,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79t00889a000800030001-8>,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9日。